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 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 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英〕理查德·琼斯 著

于树生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776-4/F·352

1994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207千

印数 3 000册

印张 9 $\frac{1}{2}$ 插页 4

定价：14.7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7年先后分七辑印行了名著三百种。现继续编印第八辑。到1998年底出版至34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8年3月

出版说明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 (Richard Jones, 1790—1855) 的代表著作。琼斯于 1833—1835 年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1835—1855 年任东印度大学黑利伯里学院的教授, 讲授经济学和历史学。其间先后担任过英国什一税委员会和慈善委员会会员。他从 W. 休厄尔、J. 赫谢尔那里学到对各门学科的归纳研究方法, 并在政治经济学中予以运用。1831 年出版的这部著作, 就是他运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在本书中, 琼斯分门别类地研究了地租的一切变化: 从原始的徭役劳动形式到现代的租地农场主地租。他考察了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以及货币地租的转化, 考察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以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不同形态为出发点的劳役地租或农奴地租、分成制地租和印度农民地租等各种形式的地租。其中许多是李嘉图没有描述过的。琼斯便据此抨击李嘉图的学说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李嘉图的学说仅仅是抽象的推理, 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的观念并无确实的真实性, 不过是政治哲学体系上的一些“妄想的假设”。

琼斯还探讨了各种土地所有制下实际地租的情况。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对地租的最后形态有所影响。他认为, 随着资本主义地租转化为超额利润, 土地所有权对工资的直接影响就终止了。也

就是说,直接占有剩余劳动的人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资本家。地租的相对量仅仅取决于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而不取决于对这种剩余劳动的榨取本身了。琼斯认为特定地点地租增加的原因有三种:一是在耕作中积累的资本量增加,收获量因之增加;二是更适当有效地运用已有的资本;三是在资本量和收获量不变的情况下,将原收获量分配给生产阶级的部分减少,而分配给地主的部分增加。李嘉图仅仅分析了第三种原因,而琼斯却注意到了其余的两种。因而,马克思说:“同李嘉图相比,琼斯不论在历史地解释现象方面,还是在经济学的细节问题上,都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他的理论中也有错误。”琼斯作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后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自然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衰落和瓦解,但同时他却在许多政治经济学问题上超过了李嘉图。因而他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现将他的这一代表著作翻译出版,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本书原著正文无章题,仅有第一卷,目录上反映的章题往往是该章第一节的节题。中译本完全根据原著译出,未予更动。

曾有人向我提意见，说我对“地租”一词没有给予正规的定义。这一点遗漏，不是有意的。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要从定义中得出结论，几乎肯定会犯错误。但是，论述定义的使用和滥用，在这里是不合适的。我已经指出对土地所有人的报酬的起源。我已经叙说了这种报酬的发展。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读者真正不能理解我们在研究的东西，我感到遗憾。可是我认为，一开始就给他一个定义作为推理的根据，不会对他有真正的帮助。

序 言

各个国家贫富不同的原因，自然而然地无论什么时候都引起人类热切的注意。然而，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很难理解的地方：一国人民可以致富的唯一途径是取得货币或者金银，而变穷的途径是失去这些金银。因此，使国家富起来的方法在于首先拥有尽可能多的珍贵金属，然后紧抓住不放，使存量不断增长。

我们必须在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陆续采取的各项措施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各种自成体系的措施中，探索从威廉征服英国到18世纪中叶各个时代的粗略的可是很明确的政治经济学。

然而，在这比较晚的时代以前，有一个时期，人们迂回曲折地通过大量的、模糊的重商主义文献，可以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朦胧的真理——一种暗示的而不是显露出来的怀疑，认为，归根到底，那累积的金银，就国家而言，也许不是增加它们的实际财富的唯一方式。可是仍然要等到加利亚尼在意大利、哈里斯在英国、魁奈在法国、尤其是斯密在苏格兰发表了各人自己的著作以后，人们才承认一项已经确立的原理，经过系统地研究和理论的证明，认为国家财富的内容可以不是仅仅限于黄金和白银，而是包括至少人们愿意用金银去交换的一切东西。

用这种新的和放大的眼光来看，那些促进和便利或者留难

和阻碍财富生产的情况，立刻成为人们急于要研究和思索的对象。在这条新路上斯密领先走在前面，自从他的时代以来，人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决不能和他所取得的结果相比。可是对那些从事于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一部门的人来说，不久又出现了另一个部门。要仔细研究那些影响国民财富的生产的情况，而不注意到和财富的分配有关的那些情况的重要性和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并且，试图发现决定土地所有人、动产所有人和劳动者各人在年产量中应得份额的法则，就会引起大量的研究，或者（也许不如说是）大量的推测。这种推测会进行得比较认真，如果人们察觉到——他们不久必然会察觉到——有权力维持某种特殊的税收方式，使其能促进生产，而这种权力在人们制订法律、可以决定社会中不同阶级在每年创造的财富中分享的份额以前，很少有人了解。

可是，探讨过决定财富分配的原则的那些人的劳动，还没有取得像那些研究影响产量的情况的人已经取得的成功。在这项学科的最新部门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知识，确定了许多原则，这些对理论和实践都是重要的，不管应用于特殊情况的时候可能多么困难。这些构成一些政治的真理，对这些真理的可靠性和永久性，人类中开明的和富有思想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大多数已经默认。而人们试图解说财富分配的指定路线，以及阐明一些限制和决定地租、工资和利润的法则的种种努力，至今除了导致许多矛盾的意见以外，仍然很少成就；并且，在某些方面造成惊人的、令人不愉快的、讨厌的和十分有害的谬论。

有关这些论点的最早的主要著作家（法国经济学家）的学说的萌芽，可以相当清楚地溯源于我们自己的伟大的洛克的一些草率

的和肯定很谬误的意见。这一派哲学家最后幻想他们可以严格地证明,地租的一部分(净收益)构成一种特殊的基金,国家所有的税收必须完全从这里直接或者间接地取得,这种古怪的和无益的教条,出于他们之手,所根据的推理和假设似乎得出结论,认为工资数目和利润率是由一些原因决定的,这些原因使他们受不到变动的影 响,并保全它们在任何可能的税收计划的作用中不被波及。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有一些谬误以及很多轻率的和复杂的推理,但其中也有许多真理,有些是属于高级的,具有长期的重要性。可是这些东西也不能挽救那些真理的声誉,并且,由于和大量的谬误交织在一起,有一个时期不那么流行,因而就不那么有用,否则一定不至于如此。这一理论体系曾获得一些忠实的和狂热的信徒,可是,尽管有这些人的热诚拥护以及它本身在理论上的可取之处,人类本能的判断却厌恶它的古怪的结论;它起初受到广大读者的嘲笑,后来,除了在文献史上留下一点痕迹以外,简直被人遗忘。斯密对他的伟大学科的这一方面做的工作很少,而且就连这一点点工作也没做好。可是他的清醒的头脑未曾发出荒谬的言论,像在他以前的某些人以及在他以后的许多人的著作中那样。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深入这种研究,这也许可以说明他意识到自己要避免的这些困难。然而,关于他这个人,确实可以说,凡是 可以期望一个人的头脑能做的工作,他都做到了。他已经证明、应用、联系和增加了在他的时代以前孤立存在于他的学科中一个主要部门的那些真理,其中大多数是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的。我们知道,这个学科本身也是由于他的著作成功而突然提高到参与人类理智努力的伟大目标的行列,并且,似乎永远不会再失去这种地位;我们必须希望,

将来总有一天会做到使它的一切错综复杂的细节都能充分发挥。

在斯密之后，马尔萨斯先生是第一个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哲学家。最早的关于那些支配土地所有人的收入，以及在文明的最先进阶段中支配劳动者工资的法则的明显观点，^①总可以在他的关于人口和地租的著作中看到，其中会有足够的东西使他具有一个坚强的和有创见的追求真理者的性格，这时候许多其他有才智的人的时间和劳动已经纠正了一些根本性错误和轻率的对一些原理的延伸——这些原理本身是真实的，虽然和最初发现者在新发现的热情中对它们的看法相比，适用的范围较小。可是马尔萨斯先生在后继者这方面特别不幸，经过他们的处理，他的著作未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真理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是被用来使一团谬误显得似乎有理，尽管其中某些部分是有独创性的和无害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欺骗性极大，并令人遗憾地非常有害。

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扬弃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令人满意地说明，凡是土地由资本家耕种的地方——他们靠存货维持生活，能随意改做其他工作——当地质量最差的耕地的耕种费用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而优质土地上的质量差别是决定它们所产生的地租的标准。

这是前进了一步，走向了解那些影响很有限的一部分地租、以及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状态中决定原产品的平均价格的原因。然而，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些原则可以真正适用的那有限的范围，仅仅根据这些原则就推断那些支配各处土地在各种情况下产生的税

^① 就地租来说，已故爱德华·韦斯特爵士应分享这种赞美。

收的性质和数目；并且，他不满足于这样，就根据同一狭隘的和有限的资料，着手创立一种全面的财富分配的理论体系并说明世界上利润率或者工资数目所以发生变动的的原因。李嘉图是有才能的人，他提出一种理论体系，很巧妙地把一些纯粹假定的真理结合在一起；但是，只须全面地看一看世界上实际存在的一切，就可以显示它和人类以往的及目前的情况完全不符。

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一直受到更糟糕的谩骂。他以卓越的聪明才智，一下子使得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人类具有的繁殖力，一种增加人类总数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长期发挥到最大程度，或者即使到一种比较小得多的程度，就会显然超过食粮任何可能的增加；并且他曾说明，各国人口很大一部分的幸福或者苦难，必然总是决定于他们自己控制这种力量的程度，或者决定于人口被外部情况压低到粮食水平的方式。他所揭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在关于决定各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状况的原因的研究中，必然总是占突出的地位，并且在那些目的在于说明支配一个民族的总人数的变化和每个社会的广大群众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数量的研究部门中，占最突出的地位，或者换句话说，它的工资率。可是，要创立并办好这样重要的一个人类知识的部门，不大可能是一个人的事；马尔萨斯先生的伟大著作肯定会含有许多谬误的成分，也包含一部分他有幸第一个加以论证的持久的真理。那些谬误的来源，部分地在于一种逻辑上有缺点的、他提出和研究的对人口的抑制因素的分类——部分地在于他思想上存在的某些模糊和犹豫之处，关于实际上人们可以期待道德原因的力量对人类的自然倾向发生作用、从而影响各国人口数字进展的程度。

真正著名的人物享有一种特权，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智慧一样，会产生很多的后果。马尔萨斯先生的错误立刻引起各式各样的争论，并产生一种说法，使整个问题蒙上一层阴影，给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十分有害的影响——确实，比任何没有天赋能力可以预见到那种古怪的轻信和鲁莽相结合的人可能预见到的危害性更大，这两者的结合是把他的猜想推进到假定的实际结论的许多著作的特征。

把地租和人口（从它影响工资这一点来说）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我们将发现，马尔萨斯先生所阐明的真理的萌芽已经被用来明显地支持像这些理论：（1）地球表面上土地的所有人的收益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不同土地的质量不同，只有在所耕种的土地的生产力的差别增加时，土地所有人的收益才可能增加；（2）这种增加，总是同时伴随有农业的生产能力减低，以及生产阶级的所得减少，并且总是带来损失和痛苦；（3）因此，需要这种增加的地主的利益，总是必然和国家的利益以及社会上各个其他阶级的利益对立的。社会中又一个主要集团——农具所有人——在国家通常发展中的命运和地位，也是在几乎同样令人沮丧的精神中被决定的。劳动的生产能力方面这种低减的后果（人们认为这应该由日益增加的地租表示），据说以低减的利润率的形式影响到资本所有人，这样，他们自己的报酬，以及他们积累新基金以便雇用劳动的能力，总是在经历一种不可避免的逐渐低减的过程，同时耕种扩展到新的土地，或者增加用在原有土地上的力量。因此，这两个比较富裕的阶级中，一个担心人口增多和耕地扩大会给他带来那种建立在公众痛苦上的、引起反感的财富，另一个则感到一种逐渐的但是不可避免

的腐朽趋势，这种趋势起源于同样的原因，并以同样的速度在进展。

这里所揭示的人口中最重要的部分——广大人民——的命运，还要更可怕。就他们来说，还有一种原因，一种像土地的肥力递减那样决定于不能改变的自然法则的原因，把他们不停地驱向苦难或者犯罪。作为身体的组成部分，他们被赋予一种增殖得比生活资料快的能力和倾向。他们的人数，只有靠那种使自己沦于犯罪或者痛苦的抑制措施，才可能压低到生活资料的水平，或者进入一种纯洁的精神节制状态。根据这个理论的创始人给它的狭隘定义，这种状态必然极少，因而不能靠它来限制痛苦和罪恶行为的广泛作用。

这最后一项意见实际上主要以前面提到的一种逻辑错误为基础，把那些原因归结为对人口的种种抑制；可是这项意见受到了利用，被轻率地和有危害性地推进到十分令人厌恶的结果，大大地增加那些不协调和痛苦的成分；人们认为，这些成分曾被证明在人类身上和人类居住的大地身上存在。据这一派著作家说，这些成分，随着世界上有人居住以及国家进步，必然会进入一种越来越发生作用的状态。取得这些结论的过程，实际上，含有不注意事实和过分利用纯粹推理能力可以造成的几乎各种可能的谬误。首先，他们假定，随着各国人口增长和变得比较文明，农业劳动中会有一种不断低减的能力；然后，那些靠体力劳动取得生活资料的人（土地的劳工阶级），完全靠从收入中节省下来的基金来维持。这一假设，对世界的一个角落或者地区来说尽管是真实的，但作为一种普遍的事实来说，却是虚妄的。还有，在这些主要的和致命的错误以

外,再加上一种看法,认为随着国家变得人多和富裕而可以看到的利润率低减,表明积累新资源的能力在降低;这一信念,没有坚强意志敢于不顾经验、不顾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历史和统计情况对真正决定各个社会中不同的积累资本的法则,是不能领会的。可是这些学说在理论上的谬误,在那些习惯于使理论观点受事实考验的人看来,尽管一定很突出,可是由于它们在实际推论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大胆,而被冲淡。想象的农业收益不断减少——那假定的对积累进展的影响——再则,由于根据一项本身就是虚妄的事实作出的错误判断,认为人类没有相应的能力为日益增多的人数提供资源——这些论点,起初曾有人支持,摆出一副武断的科学优势的神气,似乎人类幸福的永久性和天定的自然作用的法则两者之间有一种强加的矛盾。这些论点中隐晦地但是自信地和小心地暗示,指导人类内心的那种最珍爱的道德情操,归根到底只是一团迷信,人们也许可以希望它会随着哲学的进展而衰微下去。有一些方法可以避免造物主原来赋与人类的情欲,并准备推广使用,因此最终可以使人类的聪明智慧克服上天在造物安排上的缺点。关于这种使人难受的哲学含有的大胆的细节——它的持久的遮羞的罩衣——以及关于怎样使这种哲学和一部分人口发生接触的情况,在这里不得不避而不谈。可是关于这些想象中事物的理论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污染了有教养的阶级中一部分(我们希望是很小的一部分)人的道德情操。这些想象中的事物,由一些乐意的有资格的人士辛勤地传播,已经开始了那种实现自我堕落的无耻工作,并且在下等社会的一部分人中消灭了一切具有道德尊严或者道德价值的情操。凡是熟悉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这些是毫无

疑问的事实。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低估一种肤浅的哲学理论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和结果，如果我们准备主张联合起来，通过必要的艰苦努力，奠定关于这些问题的有益的真理体系的广泛基础。我们希望表明，这种真理体系可以稳妥地和巩固地建立起来。

可是，虽然它们曾有过适当的从事于有危害性和欺骗性的活动园地，假如有人认为我们提到的那种学说曾受到普遍的欢迎，那就错了。急于要提出一种理论的哲学家，有时候可能闭目不看他们周围这个世界提供的改正意见；可是广大人类各有不同的习惯，这些习惯是根据人们对于从许多原因的混合作用中发现重要的一般原则的方法的比较合理意见形成的。不需要很多敏锐的逻辑头脑就能觉察到，政治经济学中所谓普遍适用的准则，只能以最全面的对社会的观点为基础。决定那些处于不同环境下的庞大的人类团体的地位和进步、以及支配他们的行为的原则，只能从经验中得出。确实，一个人必然是肤浅的推理者，如果他仅仅靠有意识的努力，凭自己的见解、感情和动机，以及范围狭隘的亲身观察，并根据假定的推理，就期望他自己能够预测庞大的集体中所有成员的行为、发展和命运，这些人在精神或者身体气质方面和他自己不同，并受到气候、乡土、宗教、教育和政治方面各种不同之处的影响。可是，随着个人的推测第一次求助于真实存在的集体所提供的经验的结果，所有我们以上讲到的关于财富分配的准则的信念，一定会立即消失。只要我们丢开书本，请教世界上的统计图表，就会看出，那些地租最高的国家里并不总是表现农业效率的低落，而是它们那里以最小一部分人的劳动就能维持最大人口的优裕的生活。人们承认，可以在人口和财富增长中看到利润率降低，但并不把它

看作同时带来工业的任何部门中生产能力的降低，而是在利润低的国家(例如英国和荷兰)，工业的效率非常高，以及资本积累的速度非常快。另一方面，在利润率长期和经常高的那些国家(例如波兰以及欧洲和亚洲的许多比较原始的地区)，工业的生产能力几乎是众所周知地薄弱，资本积累的速度更是臭名远扬地低缓。这些事实直接导致人们作出结论，认为高利润连同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快速的积累，在人类历史上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对这个结论的仔细分析将充分显示它的正确性。

再说，看看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中不同阶层的增长率，立刻就看出：高级和中级——就是，能够几乎任意支配粮食和一切有益于健康的生活资料的那些阶级——和那些生活资料不足的人比较起来，保持独身的较多、结婚较迟，并且增加得较慢。再以国家和国家相比，也发现同样的事实。我们看到那些生活资料比较充裕的人口，不及那些公认是最困苦的人口增加得快。这些事实，对一个没有成见的观察者来说，立刻表明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种种原因及其影响，在物质生活丰裕和精神生活提高的过程中，有助于节制人类增殖能力的发挥，^①并且不会明显地化为痛苦，和几乎同样明显地不会成为纯粹的罪恶行为，或者成为一种无可指责的道德节制

^① 我们不准提到萨德勒先生宣布的那种自然规律，据说随着人口变得稠密，女性的生殖力就低减。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几句话以后再说。目前只须说明，一个草率的观察者一定也能看出，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起节制作用的原因确实存在，并看到它们和痛苦、邪恶、或者无可指责的道德节制有所不同。要说明那些原因的性质，弄清楚它们的细节，它们的作用在不同的文明阶段和组织不同的社会中被人感觉到情况——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做好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必须有广泛的和耐心的观察，以及慎重的推理。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作者以后将努力一试，深切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